

Zhejiang



Xueshu



Wenhua



Tongshi

浙江学术文化通史

近年来在浙江政府的推动下，尤其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规模宏大，投入了较多的资金，对浙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部署，参与人员众多，加上以往的研究成果，

这几年浙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对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一直有兴趣，平时开设的课程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兴趣所然，逐渐向这方面下功夫。



浙江文化在整体规模上走在前列，阶段分期很明显。北宋之交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北宋之前（含北宋），浙江文化规模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南宋之后（含南宋），浙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上升，无论是创新还是规模上，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是相对而言的，北宋之前的浙江，有的朝代在文化上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比如东晋南朝时期，文化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人物。南宋时是浙江学术文化的

高峰，浙江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人物，婺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人物上，一时间金华有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永嘉有陈傅良、叶适等，四明有杨简、袁

燮、舒?和沈焕，人物之盛，空前绝后。自先秦至北宋这一千多年间，浙江学术文化有一个高潮，这就是东晋南朝时期，此时有王羲之、谢灵运等人。自南宋至清末这七百多年间，浙江学术文化又有一个高潮，这就是南宋时期，这是浙江在学术文化上贡献最多的时期，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创新上，永嘉所视为的，浙学派，以吕

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他们与朱熹最大的不同，也是朱熹批评最多的地

ZHEJIANG XUESHU WENHUA TONGSHI

方，即重视史学的研究，这影响到了

浙江学术文化通史

后来浙江学术走向，以史学为特征，到清朝章学诚时，称之为浙东史学派。浙江这两次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都与中

国南北分裂有关，当南北对峙之时，政治中心通常会转移到江浙一带，这无疑带动了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造成这两次文化高峰之间的原因是有差别的，东晋南朝

◎ 陈爱平 / 著

年来在浙江政府的推动下，尤其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规模宏大，投入了较多的
 经费，对浙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部署，参与人员众多，加上以往的研究成果，
 近年浙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一直有兴
 平时开设的课程涉及面广，浙江文化在整体规模上自然，逐渐向这方面下功
 的分界线，北宋之前，浙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南宋之交是一个重
 之后（含南宋），浙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南宋之交是一个重
 的朝代之交，南宋之交是一个重
 的朝代在文化上的作用是很突出
 比如东晋南朝时期，文化上产生过杰出的人物。南宋时是浙江学术文化的
 浙江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人物，如钱谦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人物上，
 时间金华有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永嘉有陈傅良、叶适等，四明有杨简、袁



浙江学术文化通史

Zhejiang Xueshu Wenhua Tongshi

◎ 陈爱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学术文化通史 / 陈爱平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9-00214-5

I. 浙… II. 陈…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
浙江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964 号

浙江学术文化通史

ZHEJIANG XUESHU WENHUA TONGSHI


陈爱平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海龙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夏宁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30 千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214-5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近年来在浙江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规模宏大，投入了较多的资金，对浙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部署，参与人员众多，加上以往的研究成果，这几年浙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对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一直有兴趣，平时开设的课程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兴趣所然，逐渐向这方面下功夫。

浙江文化在整体规模上走在中国前列，阶段分期很明显，北南宋之交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北宋之前（含北宋），浙江文化规模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南宋之后（含南宋），浙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上升，无论是创新还是规模上，都是很显著的。这是相对而言的，北宋之前的浙江，有的朝代在文化上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比如东晋南朝时期，文化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人物。南宋时是浙江学术文化的顶峰，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人物，婺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人物上，一时间金华有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永嘉有陈傅良、叶适等，四明有杨简、袁燮、舒璘和沈焕，人物之盛，空前绝后。自先秦至北宋这一千多年间，浙江学术文化有一个高潮，这就是东晋南朝

时期，此时有王羲之、谢灵运等人。自南宋至清末这七百多年间，浙江学术文化又有一个高潮，这就是南宋时期，这是浙江在学术文化上贡献最多的时期，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创新上，朱熹所视为的“浙学派”，以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他们与朱熹最大的不同，也是朱熹批评最多的地方，即重视史学研究，这影响到了后来浙江学术走向，以史学为特征，到清朝章学诚时，称之为浙东史学派。

浙江这两次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都与中国南北分裂有关，当南北对峙之时，政治中心通常会转移到江浙一带，这无疑带动了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造成这两次文化高峰的原因是有差别的，东晋南朝时，首都在建康，北方南迁的豪族中，有一部分迁到浙东会稽，如王羲之、谢灵运等，这些家族给浙江文化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中国统一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浙江的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南宋时，由于都城设在杭州，杭州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朝廷文化政策较为宽松，使当时中国学术活跃、繁荣的程度可以与春秋战国相比，一时间，浙江成为各个学派传播、争议最为激烈的地区，朱学、陆学、浙学各派在浙东是各拥弟子，互相之间辩论，学术文化欣欣向荣，这种活跃的文化氛围在浙江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就浙江本地来说，浙籍人士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被朱熹所批驳的浙学派，细分起来有吕祖谦的婺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陈傅、叶适的事功之学，在庆元府，则有属于陆学的甬上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璘和沈焕，四人之中，以杨简的学术最有成就。在《宋元学案》一书中，所列南宋学案有40个，其中浙江就独占17个，占42.5%，这样的辉煌成就，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的浙江都未能够达到过的，这是两千多年来，浙江学术文化的顶峰时

期，也是浙江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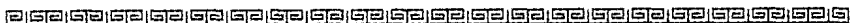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受到多方注意，研究成果不断，如《浙江古代史》、《浙江文化史》、《浙江思想学术史》等，都是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对浙江文化的全面研究，各有不同的特色，这些多是属于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浙江学术文化的成果更多。在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要将跨度二千多年的浙江学术文化展示清楚，殊为不易，众多文献资料的收集、甄别、梳理，是对耐心、能力的挑战。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及自己的处理方法需要说明一下，这些对于理解本书的主旨是有帮助的。由于题目较大，所以，本书力图尽量地理清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尽管这样做的工作量很大，且难度较高，但这样处理资料，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更易将学术文化史的脉络阐述清楚。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写作时，尽可能地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梳理清楚，这样，对这个人的个人经历的关注较多，尽可能地将其师承与交游作简单的考述。对于唐朝时期，浙江学术文化的处理是比较难的，主要是因为唐朝一代以诗歌为特色，故描述以诗人为主，考虑到全书的体例，宗教内容没有纳入进来，这样处理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更易于把握。在地名使用上，尽可能使用当时的地名，对不好处理的，就使用今地名，如宁波，北宋时称四明，而南宋时称庆元，当涉及到北南宋的数据统计时，就使用今地名宁波。在文献资料的使用上，主要使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虽然非善本，但考虑到系统性，主要以这两部最大的丛书为主。对于一些后来编辑的个人文集，要是较为全面的，就以后出版的文集为主。在时间跨度上，虽然说是《浙江学术文化通史》，实际上不涉及近代内容，依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将龚自珍视为是近代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原则上不讨论龚自珍之后的人物，实

际写作时,依照学术风格和继承关系,会写到比龚自珍晚出的人物,如俞樾、孙诒让等。

本书写作过程中,对于征引他人的成果,尽量一一注明,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在个人生平研究上,较多地使用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对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陈爱平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浙江学术文化	/1
第一节 王充与《论衡》	/2
第二节 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5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学术文化	/9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	/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学术文化的成因	/28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浙江学术文化	/65
第一节 著名的诗人	/65
第二节 湖州联唱	/81
第三节 浙西唐诗之路	/83
第四节 浙东联唱	/92
第五节 浙东唐诗之路	/94
第六节 隋唐学术文化发展概述	/104
第四章 两宋时期浙江学术文化	/105
第一节 《宋史》浙江入传人物与四库全书浙江人著作统计	/105
第二节 四明五先生	/110
第三节 永嘉九先生	/115

第四节	南宋时浙江学术文化	/118
第五节	宋元浙江学术文化总体分析	/187
第五章	明朝浙江学术文化	/194
第一节	明朝初期浙江学术文化	/194
第二节	明朝中后期浙江学术文化	/217
第三节	明朝浙江学术文化的总体分析	/257
第六章	清朝浙江学术文化	/290
第一节	清初浙江学术概述	/290
第二节	浙东学术	/294
第三节	浙西学术	/351
第四节	清朝浙江学术文化总体分析	/394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浙江学术文化

秦汉时期,和北方相比,浙江文化是很落后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正史入传人物的数量上看出。根据《汉书》和《后汉书》入传人物统计,《汉书》人物只有1人,是山阴人郑吉。《后汉书》浙江人物16人,其中山阴6人,上虞6人,余姚2人,义乌和由拳各一人,浙江其他地方尚无人进入正史。也就是说,两汉时期浙江人物只集中在一个地区,那就是以会稽为中心,包括上虞和余姚这两个地区。

综合《后汉书》和《浙江通志·经籍》的记载,有著作传世的唯会稽赵晔、袁康,上虞王充(27—约97)、魏郎数人。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著作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王充的《论衡》。赵晔在《后汉书》卷79中有传,记载较为简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县吏,奉檄迎督邮,因耻于厮役,去了犍为资中拜著名的杜抚学韩诗,在四川一呆就是二十年,以至于家里以为他已经死去,尝为之发表。赵晔之著名,主要是因为他有幸留下了《吴越春秋》一书,此书收入四库全书载记类,今天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国的历史,正是通过此书的记载。但在东汉时期,赵晔之著名,则是他的另一本书《诗细》,遗憾的是,这本书已经失传。赵晔本来是以研究《诗》著称,他在犍为资中学韩诗二十年,《诗细》是他一部有关诗的著作。东汉末的蔡邕避难于吴会之时,见到了赵晔的《诗细》和王充的《论衡》,蔡邕称赞过的南方人写的著作,也就是这两种,他对《诗细》的评价要高于《论衡》,“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

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① 当时的蔡邕属于鲁诗派，而赵晔属于韩诗派，赵晔师从杜抚，杜抚可考的弟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南阳冯良，另一个便是赵晔。赵晔之《诗细》不能传到今天，是历史的必然，汉朝传《诗》的共有四家，《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前三家都立博士，是为今文经，只有《毛诗》属于古文经，东汉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致使今文经学派的典籍失传，附属于今文经的其他作品也随之失传，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越绝书》的作者袁康、吴平两人，《后汉书》中无传，此两人都是会稽人。说袁康、吴平是《越绝书》的作者，是王充在《论衡·按书篇》中的记载：“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衡，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越绝书》中以字谜的方式对该书作者做了一番考证：“其有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为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②《越绝书》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也是记载先秦时期的吴越历史，不过，在体例上更加近于地方志，故今天有人以为，《越绝书》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当然，这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观点。^③

第一节 王充与《论衡》

在东汉所出的三个著名的人物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王充了，王充之著名，就在于他的《论衡》一书。与赵晔只通韩诗一

① 《后汉书·儒林·赵晔传》卷 109

②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叙外传记》卷 15 四库全书 括号中的字是四库馆臣所加

③ 关于中国最早的地方志，现在的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以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是《华阳国志》，一种以为是《越绝书》。

家不同的是,王充则兼通五经,他是班彪的学生,著有多种书,《讥俗书》、《政务书》,及晚年作的《养性书》,今皆不传,只有《论衡》一书颇为有名。蔡邕对《论衡》一书的评价不及赵晔的《诗细》,北方人对来自于会稽的这两本书的看法也完全不同,大抵对《诗细》一书很欣赏,但对《论衡》则颇有争议。蔡邕初见《论衡》时,以为是书只能作为谈助之资,“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①《论衡》一书以辩驳著称,这可能与王充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充的个人传记,在《论衡·自纪篇》中谈得非常清楚,王充自称出身于细族家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但其性恬淡,不贪富贵。做过县吏,以数谏诤不合去。正是由于王充的愤世嫉俗的性格,造就了他好辩驳的文章风格,关于这一点,用不着我们来分析,他自己就谈得很清楚:“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看来,王充的每一本书,都是有感而发,不作空谈,他自己能明显地感觉得到,“充书违诡于俗”,^②所以,他的《论衡》一书不独在当时就遭到了批评,在后来的历史上也是颇遭指责,尤其是他在《论衡》一书中的“刺孟篇”、“问孔篇”,常常遭到来自后人的辩驳,其他观点,也多遭批驳。

《论衡》的出现,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连。西汉武帝时,董仲舒虽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观念,只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融合起来,迷信的思想尚不浓厚。到了东汉初年,谶纬学说开始泛滥,尤其是光武帝刘秀的提倡,谶纬学说竟然成了官方学术。公元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会后由班固等人将会议内容进行了整理,这就是《白虎通义》,这部官方著作中,掺入了谶纬思想。这一年,王充53岁,班固48岁,王充的老师、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0 子部30 杂家类4

② 【汉】王充:《论衡·自纪篇》 四库全书本

班固的父亲班彪离世已有 26 年了。《论衡》的思想远离了当时占据主流的谶纬学说，黄晖是《论衡》最著名的注家，他对《论衡》一书的思想进行了归类，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说性命、说天人关系、论人鬼关系、论天人感应说和虚妄之说、讨论程量贤佞才智、自序和自传。我们无需面面俱到地将《论衡》中的思想进行讨论，可就其中最为突出的地方加以说明。王充是第一个系统地对天人感应学说、谶纬学说进行批评的人。在王充之前，就有西汉中期的郑兴、东汉初光武帝时的尹敏、桓谭反对谶纬学说。当光武帝刘秀叫尹敏校订图谶的时候，遭到尹敏的非议：“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①桓谭反对谶纬学说尤其激烈，刘秀对谶纬深信不疑，大小政事，都决之于谶纬。为此，桓谭特地上书表示反对：“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懣，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羸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②王充较尹敏、桓谭稍晚出，继承了他们反对谶纬的思想，著《论衡》，系统地对天人感应、谶纬等学说提出了批驳。

王充在晚年时得到在会稽任“督邮”、“主簿”的谢夷吾的推荐，谢夷吾在思想上是支持王充的。汉末蔡邕、三国王朗，对《论衡》一书的观点都是赞赏的。直到中唐，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将《论衡》的地位摆在六经之前，刘知几《史通》一书中的《疑古》、《惑疑》实

① 《后汉书·儒林·尹敏传》卷 79(上)

② 《后汉书·桓谭传》卷 58(上)

实际上是继承《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的内容,对传统的儒家经典提出了一些疑问。然而,自宋朝开始,《论衡》一书遭到强烈的非议,很重要的原因是《论衡》一书中有《问孔》、《刺孟》篇。自宋至清,对王充的批评多于好评。乾隆皇帝是亲自上阵,对王充的思想进行驳斥:“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①客观地说,王充的《论衡》在产生之后近千年内都不太引人注目,在儒家学说占主流的时代,王充的思想属于另类,他受到广泛关注是在民国时对子部研究日益重视之后的事了。

第二节 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如果仅凭正史的记载,还不能够全面地反映出秦汉时期浙江学术全貌,在东汉末年,会稽出了一个著名的易学家,这就是魏伯阳。有关魏伯阳的生平不清,正史没有记载,最早记载他的事迹的是东晋时江苏句容人葛洪(约283—363年),葛洪在《神仙传》卷2中,称魏伯阳是吴人,几十年之后,阳夏袁宏(328—376年)著述《后汉纪》,继承了葛洪的说法。自葛洪提出魏伯阳是吴人之后五百多年,五代时著名的道士,浙江永康人彭晓(?—954年)在《周易参同契通真义》的序言中,很明确地指出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②可能彭晓见到了后人没人见到过的资料。在清朝编修的《江南通志》中,仍然将魏伯阳写作是吴人,而在《浙江通志》中,则明确地将魏伯阳写作是浙江会稽上虞人。现在,一般习惯上将魏伯阳视作

^① 见四库全书本《论衡》卷首乾隆皇帝序言

^② 【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自序》四库全书本

是会稽上虞人。

魏伯阳的著名,就在于他的《周易参同契》一书,此书只有六千多字,文字晦涩难懂,其中有些文字涉及到炼丹的过程,全文分为上中下篇,以下仅引用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句话:“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金以砂为主,秉和于水银,变化成由其真,终始自相因。作服食仙,宜以同类者,植禾当以黍,孵鸡用其卵,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鱼目岂为珠,蓬蒿不成檟,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是以燕雀不生风,狐兔不乳马,水流不炎上,火动不润不。”^①这句话以晦涩的言语描述了炼丹的过程。其实,《周易参同契》中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的内容,如阴阳五行、八卦等,五行学说和八卦是汉朝时解释《周易》最为典型的方式,这种解释的典型著作是西汉中期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人京房的《京氏易传》,魏伯阳显然接受了这一影响,著作中有显著的汉易特征。作为东汉末期的人,魏伯阳对《周易》的解读有创新,这种创新就是将炼丹融入到了易学中,他的这一思想被六七十年之后的葛洪所吸收,葛洪的炼丹派所贯穿的思想,是对魏伯阳思想的一种继承。自魏伯阳之后经历六百多年,到北宋陈抟(871—989年)时,魏伯阳的学说再次经历了一大变,这就是陈抟的《易龙图》,陈氏在《易龙图》中,首创了修内丹的方法,将道教与易学进一步结合。这是中国易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几十年之后的邵雍(1011—1077年)的《皇极经世书》、周敦颐(1017—1073年)的《太极图》就是源自于陈抟的学说。应当说,宋朝理学对《周易》的解释,可以上溯到魏伯阳。

《周易参同契》对后世影响较大,后世对其注释较多,比较著名的几种,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五代彭晓的《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南宋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南宋陈显微的《周易参同契解》、南宋俞琰(1253—1316年)的《周易参同契发挥》、元陈致虚

①【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上篇第十二章 四库全书本

(1290—?)的《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这些解释对我们今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部晦涩难懂的书提供了方便。

两汉时期的浙江文化主要是由外部输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北方人流寓会稽，促进了文化交流，一种是会稽人出外游学，学成后或做官或回会稽。至于北方人流寓会稽，在《后汉书·任延传》中有“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19，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根据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篇中清朝周世兄的考证，《后汉书》中提到的董子仪应当是北方人，严子陵就是严光，余姚人，与东汉开国君刘秀友好。从《任延传》中知道有北方人避难会稽的较多，但因资料记载不祥，具体情况无法知道。不过《浙江通志》中辑有两汉时期流寓会稽的7人，分别是梅福、袁忠、许靖、陆璠、蔡邕、桓晔、孔潜。^① 其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孔潜，孔潜汉末避地会稽，是后来山阴大姓孔氏的祖先，在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孔氏出了许多人，不独正史入传的多，部分人有多种著作，在文化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个是蔡邕，蔡邕陈留圉人，对促进南方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王充的《论衡》、赵晔的《诗细》都是由蔡邕传到北方，使北方人了解到了南方人的文化。

至于会稽人外出游学，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情况。在以上有著作的四人中，除袁康生平不详外，赵晔到犍为资中，受教于杜抚的《韩诗》，前后二十年。杜抚的老师是薛汉，薛汉是淮阳人，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② 至于王充，则游学京师，受学于班彪。班彪、班固父子，都属于兼通五经的学者。魏郎“从博士郗仲信学《春

① 《浙江通志·寓贤下·绍兴府》卷195 四库全书本

② 《后汉书·儒林》卷七十九(下)

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①可见两汉时期会稽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一部分人到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这是促进会稽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虽然秦汉时期浙江文化只集中在山阴、上虞和余姚这一小范围内，规模不大，我们只能通过现在仅存的四本书《论衡》、《吴越春秋》、《越绝书》和《周易参同契》来窥其概貌。这四本书都由《四库全书》著录，王充的《论衡》尤为著名，历史上关于它的争议很大，有批驳它的，也有赞同它的观点的，但无论怎样，在汉朝时子部书籍中，它是唯一保存到今天的出自浙江人手中的著作，也是唯一的保存到今天的出自南方人手中的汉朝子部著作，所以，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至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是中国地方史书的开始，《越绝书》在地方志上的地位问题，虽然有争议，但将它视为中国地方志的萌芽是不会有问题的，后来浙江号称为“方志之乡”，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

^① 《后汉书·魏朗传》卷97